

# 少林寺“托管”模式一周年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图



云南昆明官渡少林寺

## 核心提示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少林寺也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如今,少林寺成了河南乃至中国的一张金灿灿名片。在这张金灿灿名片的背后,2008年11月24日,少林寺首次以“托管”方式接管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4座千年古刹。“托管”是佛教界的新鲜事物,少林寺与昆明市是如何“结缘”的?这种合作将给双方带来什么?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对此,记者远赴云南昆明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 一个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

云南昆明官渡,是一个充满神奇故事的千年古镇。这个地处滇池北岸的古镇,被称为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据说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临近滇池,先民以捕食螺蛳为生,久而久之,螺蛳壳堆积如山。古人把螺蛳叫做“蜗牛”,也就给这个小渔村起名为蜗洞。到了与隋唐同年代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蜗洞发展成滇池岸边的交通要塞,宋朝之前在这里设了渡口,过往客商官船停靠,然后坐轿骑马进入昆明城。蜗洞也就改名官渡了。元朝设官渡县,明朝官员来滇镇守时,官署也设在官渡。一时间,“多少行人此来往,马蹄踏破五更霜”。

许多年后,昆明在岁月里变换了几番模样,官渡却依旧保持着千年来的矜持。人们慕名而来,寻找过去的痕迹和那些藏在旧时光中的秘密。于是,在钢筋丛林中,人们看到了闪着金光的金刚塔。在飞机起降的轰鸣中,看到了宝象河堤岸上奔驰的小汽车。在百米高的世纪城观景塔上,看到了那片被现代化包围着的古建筑。

4000多年的时光恍惚,这座遗留下来的古镇,像一个隐于闹市的高人,任凭多少风雨,多少繁华呼啸而过,他泰然自若。

曾经,官渡的沉寂仿佛4000多年历史的断层,骤然离去,又突然再现。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昆明也少有人知道,在离市区不足十公里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官渡古镇。因为,在他们生活里一直有一个官渡

区,是昆明市的行政区域。直到2001年,金刚塔的抬升和古镇的恢复重建,才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古老的城镇。

一个繁华的渡口,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各种宗教文化也在此交融。如今,小小一个古镇官渡,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号称有五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文化遗迹,国家、省、市级的文物古迹30余处。从唐到清多个朝代遗迹、儒释道多教共处,“一镇五朝”、“一镇三教”,成为官渡古镇的独特景观。

曾经的古渡口离滇池遥远起来,但官渡仍处在繁华都市的背影后,像个老人,讲述着他的前世今生。

## 四座古寺的破茧化蝶之痛

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使官渡古镇几经兴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官渡古镇正经历着脱茧化蝶之痛。

曾经让官渡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古刹,在风雨的吹打下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那些古老的庙宇建筑大多破败不堪,庙堂里的和尚也无奈地离去。整个古镇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再也找不到昔日辉煌的影子。

如何再重振官渡古镇当年的辉煌和繁华,成了昆明市和官渡区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2001年11月,在昆明市官渡区政府的主导下,官渡古镇成立了“古镇恢复建设工程指挥部”,开始了对古镇修缮建设。首先修复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明代喇嘛塔式塔身金刚宝塔,接着又重修了妙湛寺及孔庙、武庙等建筑,还逐步恢复了民俗民间文化活动,并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规划中。

然而,这项斥巨资进行大手笔修缮并未吸引来更多的人气。很多相关的配套设施并未完全到位,使得古镇的脱茧化蝶过程更加阵痛。

官渡区宗教局局长豆卫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官渡古镇的历史沉淀非常深厚,但是要想再重振当年的辉煌做起来非常艰难。可是再难,我们也舍不得去,因为这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谈起官渡古镇的4座千年古刹,他说,最初的时候,寺庙里有和尚,香火还可以,但是到了后来,和尚们逐渐走了出去,香火也逐渐黯淡了很多。随后政府接手开始管理这几个寺庙,并且请来了和尚。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和尚也离开了,这下寺庙更加显得冷清。既然是寺庙,并且还属于古建筑,总得有人管理吧,政府最后运用市场化运作方法,与一家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合同,交给他们进行管理。旅行社为了不赔钱,开始收起了门票,每

来一位游客收取5元钱的门票。这下子引起了很多游客的不满,来游玩的人是越来越少,几乎断了香火。渴望以此能够有所带动的,可最终结果却是很令人失望。无奈之下,双方解除了合约。4座寺院在2007年11月25日被官渡区宗教局接手,进行管理。接手后,官渡区宗教局首先取消了向游客收取门票的规定,这个行动让很多人拍手叫好,可叫好的背后,官渡区宗教局陷入了尴尬局面。为了寺庙的安全和卫生问题,我们必须得投入人力和财力,这还不包括日常的一些开销及小范围内的修缮。可既然接手了,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做啊。请来了32名保安,保护四座寺庙的安全问题,又请来了6名保洁员,维护寺庙的卫生。此刻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就是,寺庙里一个和尚都没有。千年古寺没和尚,这个说出去多丢人啊。说到这里,豆卫保也显得极为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昆明市开始了一个大胆想法。请一带外和尚进行“托管”模式运作管理,以此来恢复古镇4座寺庙的辉煌,带动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可是如何去找到合适的高僧和尚,这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一次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位领导说了句“河南登封的少林寺运作模式很成熟,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一语中的,让在座的人茅塞顿开。对,我们何不请少林寺的高僧们来进行合作呢。这个提议让他们兴奋不已,会议开始围绕请少林寺高僧的话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 一个颇受质疑的“托管”模式

激烈讨论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让他们心里也没底,少林寺高僧会不会同意这种合作方法呢?他们抱着试试的心里,开始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少林寺联系。

2008年8月份,官渡区有关部门正式跟少林寺开始接触,谈合作的事情。经过双方的多次接触,少林寺被他们的诚恳打动了,有意愿进行友好合作。11月份,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邀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走访昆明,并认真考察官渡古镇的寺庙,确定委托管理的基本思路,为双发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11月24日,昆明方面派出3人,前来河南少林寺正式签订“托管”合作书。官渡区宗教局局长豆卫保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他看来,能与少林寺达成托管协议,就意味着官渡区四寺院傍上名寺后,将迅速走上旅游观光的快车道。

双方在“托管”合作中约定,少林寺接管妙湛寺、土主庙、法定寺和观音寺四古刹,期限为20年。并约定,托管期间少林寺要派僧人进驻四所古刹,并按少林寺的治寺理念和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四所寺庙获得的收益、接受的捐赠、经销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全部收入,则归少林寺所有。

在签约时,仇和发来贺信:“希望合作双方能积极开展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凝聚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力量。”

云南与河南,这种新的“南南合作”之所以成为现实,豆卫保认为,取决于古镇的悠久历史,还有“领导的重视”。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宗教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这确实是个大手笔。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托管’4座寺院,是现今佛教界的新鲜事物。”

其实,利用宗教资源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也应该是个新鲜事物。这个新鲜事物的好处是,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品牌效应和管理模式,聚拢人气,推动旅游发展;另一方借助他者的区位优势,弘扬佛教文化,两方各得其利。

“少林寺托管昆明四古刹”的消息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网民讨论尤为热烈,有为此而拍手叫好的,也有人对此产生了很大质疑。

支持者认为,现代社会急剧变化,日新月异,宗教要有改革创新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少林寺多年来以振兴禅宗祖庭,弘扬佛教文化为己任,锐意改革创新,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努力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以武术和医药为代表的少林文化在全球声名鹊起,既是弘扬少林文化,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塑造中国尊重宗教自由的良好形象。

而有些人却提出,少林托管昆明4所寺庙,这对于昆明来说,在少林文化发扬壮大的同时,相信带动旅游的发展。此举有一定开拓意义,但是也提出了新的命题,将寺庙类似于连锁形式的公司化经营,是不是会降低佛教文化的神圣性,而给大众造成世俗化的心理定势?外来的和尚是不是真能念“昆明的经”,少林寺有少林寺的文化背景和当地的民俗民风,昆明也有与不太一样的民俗民风,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个被外来和尚改变的古镇

面对外来的种种质疑和不理解,并未能让少林寺与昆明的4座寺庙“托管”模式的脚步停下来。在签订合作书不久,少林寺即派出了僧团远赴昆明官渡4座寺庙,正式开始了“托管”实质性运作。

少林寺僧团进驻官渡4座古刹后,引起了当地各界巨大反响。一时间,官渡少林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话题。

官渡少林寺负责人释延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的民风非常朴实,他



游人如织的官渡古镇老街

# 新闻时评

## 电动车国标当服从民生

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电摩新国标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它不仅涉及电动摩托车,还跟全国目前在路上跑的1.2亿辆电动自行车息息相关。按照新国标的说法,时速在20公里以上、自重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都要按机动车管理,车主要考驾照、要买交强险、要上快车道,这一标准引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呼:电动车也骑不起了,上快车道也更不安全了。

超速电动车要归为机动车管理,据说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但搞到后来,反而可能更不安全也骑不起,这事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似乎不能不调整,但调整又会伤及民生,怎么办?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建议“电动车限速从目前的20公里改为35公里”,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何祚庥认为,在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问题上,有一个特有的混乱理念,往往把可在市场销售的合格产品应具备的“质量”标准,和道路许可通行“标准”混为一谈。的确是如此,很多汽车设计最高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但我国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却是120公里,如果按照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要求,那么所有的汽车是不是都只能设计120公里的最高时速呢?

很多报道披露了这样一条消息:目前国内1.2亿辆的电动车,绝大部分最高时速都超过了20公里,自重也不止40公斤。这其实呈现了一种现实的民生状态: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对电动车的速度要求更高了,“20公里以上算机动车”这一新国标里面的规定,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毕竟任何一级的交管部门,也无法拿出电动车时速超过20公里就能造成事故增多的数据。如果一条法律规定令绝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间违法,那就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标准本身有问题,需要应时而变了。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本意是为民众正常生活提供一个有序和安全的环境,它的终极目标是民生,它是为民生服务的,而不是成为民众权利实现的障碍。具体到新国标“超过20公里算机动车”的规定,它已经成为民众实现“价廉物美出行权利”的障碍,在权利面前,应该让路的是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而不是硬生生地让民众牺牲权利来迎合不合理的国标和法律条文。这看似只是一个电动车标准如何制定的技术问题,实质上却是权力与权利谁该为谁让路的问题。

现在离电摩新国标实施还有20天的时间,何祚庥院士提出的“权力为民生让路”电动车标准解决方案,会不会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值得期待。但从中自协的抗议如石沉大海来看,何祚庥的建议会不会仅仅成为建议,又不得不让人忧心忡忡。

赵勇

## 1年赔1万与生命教育的集体缺失

关于湘潭踩踏事件的赔偿问题,据一位罹难学生亲属介绍,当地政府最开始给出的方案是按年龄算赔偿金额,一年1万元,但是遭到强烈反对。之后,工作人员提出一次性赔偿20多万元,也没有获得家属同意。(见12月9日南方网)

虽然问责与赔偿,对于宝贵的生命来说,最多只有告慰意义,但是,如若“按年龄1年赔1万”这种赔偿逻辑,是不是新生儿的赔偿是“零”,连一条宠物的价都不值?

这种可笑、荒唐的方案被拒是必然的,但我们对此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这个方案没有被接纳上,而需警醒,有这种“生命意识”的官员,需在工作中,怎样对待老百姓的生命。

连日来,媒体接连曝光了发生事故的这所学校的管理问题,包括教学楼楼道灯光昏暗,只有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现场管理,教学楼设计不合理,学生作息制度安排不合理等等。把这些具体的细节,与当地官员的“赔偿方案”联系起来,会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释——节省下来的电费、人工费、管理费,对于赔偿学生家长的损失来说,绰绰有余,按年龄赔偿,初中生最多十五六万,多聘管理人员,一年少则几万,更何况,发生事故,还是小概率事件!

参与此次赔偿的官员,应该多为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或者与教育相关部门负责人,笔者由此更为担心的是,这次惨案的教训并不会被当地教育部门、学校认真吸取,他们会由此转变学校的管理方式,推行人性化教育管理么?

多年来,虽然有上级部门不断

下发通知,要求各类学校重视学生的生命教育,去年9月1日,教育部还通过电视,为全国中小学生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可是,各地的校园安全事故还是频发,生命教育仍旧是学校教育中十分薄弱的环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问题?现在这个“按年龄1年赔1万”的方案,让我明白,应试教育体系或是一方面原因,而对普通百姓生命的漠视,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要开展对于学生的生命教育,当下更紧迫的是要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办学者进行生命教育,要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尊严、平等。从这一意义上看,对于政府部门和官员,应以生命尊严的名义,让其对所有当事家长和公众道歉,并追究责任。

奇丙

## 警惕倒“丁字形”社会伤疤

我们常常谈论“纺锤形”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的的社会里,富豪和贫困者只是“纺锤”两端的极小一部分,居中的绝大部分,则是温饱有余的中产阶层。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为止最为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

近日,重庆社科院多位专家联手完成了2008年度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课题组专家认为,重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倒“丁字形”。(12月9日华龙网)

细细研读这个倒“丁字形”结构,不难发现,正如专家细的研究结果所言,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处在丁字的那一横上;而一竖主要是代表着人口规模不大的社会管理者或者说领导群体。这一社会阶层状态,与公众对目前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感知非常吻合。很明显,虽然这个研究结果有着重庆的地方特色,却也是我国目前社会阶层分化状态的真实写照。

稍微远离一下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种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来的社会阶层分布情况,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简而言之,处在倒“丁”字那一竖上、占人口极少的群体,不但在社会地位上处在高位,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占有上最大可能地分割且享用了社会财富。而处在倒“丁”字那一横上的,则用“支付”的方式,支撑起了倒“丁”字的那一竖。

这是一个不甚理想的社会结构。但有意思的是,此课题的研究专家却告诉我们:重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总体是和谐的。不说在教育、医疗、住房这类琐碎却能深刻地刻画出社会伤痕的社会话题中,处在倒“丁字形”结构上的两种人会有截然不同的感知,反以近日的一个发端于网络的新闻为例,就可看出这种倒“丁字形”社会阶层结构,实际上是一道社会伤疤。

还是在重庆。11月18日,云阳县的云峰村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凉鞋,提着一个用旧油漆桶改制的小火炉,在雪中一蹦一跳地向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走去。

是谁制造了这个让人无比酸楚的故事,在重庆的社会阶层研究专家得出相关研究结果的时候,或许已经无需追索答案。虽然,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叫“向上流动”,只是,在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固化甚至顽固固化的当下,在既得利益群体占据话语高地的当下,在既得利益群体漠视公平公正的当下,“向上流动”,并不只具有物理意义上的高难度。

诚然,描出一份真实的社会阶层分布状况画卷,已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贵性。但是,如果其社会意义仅停留在学术成就上,而不是据此反省,并做出相应的动作,那么,这一道倒“丁字形”的社会伤疤,无疑会继续扩大。

苗松

## 假想敌

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向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表示,前段时间广州公安局联合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反恐演习所用的假想敌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刘小钢说,“作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觉得公安部门这么做不太好。”(12月9日《信息时报》)

虽是演习,假想对象未必不会成为真实的打击目标。这就好比一个想当演员的年轻人,绝无可能到肉联厂去实习。

不可否认,有些讨薪群体性事件并非和平理性。然而,社会治安问题、一般违法犯罪事件以及权益诉求行动与恐怖主义事件有根本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事件,有的要用催泪弹,有的则要坐下来谈判。

工会人士说“不舒服”、“不太好”,我觉得说轻了,给出了对方面子。把什么人、什么事情作为国家机器的假想敌,这是你想选择什么样的治理状态问题。文/刘敏 漫画/曹一

